美国的公民结社

——《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

历史学院 徐欣怡 2015202663

【摘要】美国的公民结社在美国的民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本文将谈到美国的公民结社与民主的关系、社团在政界的作用、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关于结社和报刊的关系、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以及公民结社在当今美国社会所发生的作用。

【关键词】公民结社；美国的民主；一般结社；政治结社；当今社会的公民结社

托克维尔抽象出的美国的民主共有三个特征，它们解释了一个民主国家繁荣兴旺的原因。这三个特征分别是地方政府、公民结社以及托克维尔所说的“宗教精神”。本文将讨论美国的公民结社这一民主特征。

一、美国的公民结社与民主的关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英裔美国人对结社权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很普遍的，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外，还有许多必须依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和发展的社团。这与美国人对社会的主管当局的不信任和怀疑有关，美国人习惯于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而不是向主管当局求援。正是通过联合和参与公共事业，人们才能培养出对自由的热爱。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他们便将更加互相同情对方的不幸。因为民主打破了阶级所造成的隔膜，在平等的民主社会中，人们容易将心比心。但是同时，身份平等的扩大扩展了个人主义。在民主时代，每个人对全体的义务日益明确，而为某一个人尽忠的事情却比较少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护情谊虽然广泛，但却稀薄了。随着身份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便出现了。这些人的财富和权力虽然不足以对其同胞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但他们拥有或保有的知识和财力，却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而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个人主义的兴起最终会导致一种民主的专制，即柔性专制，这比“多数人的暴政”要危险的多。托克维尔认为，默许是专制原则的存在。由于一切彼此对抗的力量都被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公民毫无选择，只能让国家成为自己的监护人：“他们认为监护人是自己选的，所以安于被人监护。”

总的来说，随着一个国家实现身份平等，个人就显得越来越弱小，而社会越来越强大。也可以说每个公民都变得跟其他公民相同，被埋没在群众之中，只能看到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了。政府被所有的人想象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它可以使公民安全，预见并保证公民的需要，为公民的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样，就使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很少运用和不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的能力。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一切的习惯，也就是强制人们忍受这一切，甚至往往把这一切视为恩惠。统治者就是这样把每个公民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遵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他们，然后将手伸向整个社会。他用一张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统一的规则的密网将社会覆盖，最有独创精神和坚强意志的人们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们的意志，只采用软化、驯服和指挥的方法。他不强迫人们行动，只是不断妨碍人们的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一些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是他限制和压制人们，使人们精神颓靡、麻木不仁和意志消沉，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管理这些牲畜的牧人。

而美国公民结社的发达有效的缓解了柔性专制主义对自由的破坏。既然结社权是公认的，所以公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行使。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团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美国人通过自由结社培养自己管理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能力。发达的公民结社与政府的集权相抗衡，抵御了柔性专制主义对自由悄无声息的腐蚀，培养出人们对自由的热爱：“在美国，我遇到过一些我坦白承认我向来一无所知的社团，而且，我要对美国人使用的各种技艺表示惊叹：它们既能动员多数人的力量共赴一个目标，又能让人们自由地前进。”

二、社团在政界的作用

现在，先叙述社团对政界发生的作用。美国的政治社团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写作自由到行使集会权，再到将代议制用于政党。一个社团可以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并约定以某种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获胜。因此，结社权与写作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即拥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但是，早先建立的社团，却比出版界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是结社权与写作自由的区别。当一种见解由一个社团来代表时，它必须具有简单明确的形式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这个社团要拥有它的支持者，并让支持者为本社团的事业献身。这是出版社所达不到的。支持者们彼此结识以后，他们的热情便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强。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集结在一起，促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奔向由它指明的唯一目标。行使结社权的第二阶段，是行使集会权。当人们有了共同的主张后，便希望把主张付诸于实践，于是便要行使集会权。当一个政治社团将其活动中心设在国内的某个重要地点时，它的活动显然要强大，而它的影响也将扩大。在那里，人们容易互相见面，各种执行手段可以结合使用，思想可以用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和热情向外传播。因为交流时思想传播的速度和深度要远远快于和深于文字传播的速度。最后，在政治方面，结社权的第三阶段是：同一见解的支持者们可以组成选举团，选出代表到中央立法机构去代表本社团。这就是真正将代议制用于政党。

那么，美国人如何将代议制用于社团？第一，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彼此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第二，他们要组成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小团体；第三，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他们的代表表面上好像是在代表多数，而其实只代表他们的支持者的集体。他们的支持者也给人以代表国家和由此而来的一切道义力量的外貌。不错，这些支持者不能像他们那样有权制定法律，但支持者们可以攻击现行的法律和协助他们草拟法律。

但是，美国的政治社团也会对国家造成一定的危害。假如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易于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在它的立法者的多数之旁，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它的公共秩序一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证明一项法律本身比另一项法律好，与证明这项法律应代替另一项法律，其间无疑有很大不同。但是，当聪明人的智慧又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时，他便不再考虑众人的想象。有时，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派，每派都争做多数的代表。如果在领导权之旁再建立一个道义权威几乎与它同样大的权力，领导权将会把理论付诸实践。结社的目的将从引导舆论发展到强制舆论，从审议法律发展到立法。出版自由在现代世界里是自由的主要成分，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全力尊重自由。但是，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在美国，一旦一个党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大权就都落于它的手中；它的党徒也将取得各种官职，掌握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党的最有名人物也不能打破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藩篱，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对压制他们的强大物质力量。再也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但是，这个如此危险的自由，却在一点上提供了保障：即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没有秘密结社的。在美国，只有党派分子，而没阴谋造反者。

显而易见，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因此，托克维尔说了一句名言：“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托克维尔与卢梭之所以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坚持地方自愿团队和结社的重要性。卢梭曾经警告“党派团队”的危险，因为它们有阻挠公意的倾向。而托克维尔则认为政治结社是抗衡柔性专制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三、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

美国存在的政治结社，不过是美国的五花八门的结社中的一种。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也有广泛的运用。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队，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队。既有宗教团队，又有道德团队；既有十分认真的团队，又有非常无聊的团队；既有非常一般的团队，又有非常特殊的团队；既有规模庞大的团队，又有规模甚小的团队。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队。他们也用这种方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队。美国人干一点儿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因此，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使全体人民最长于共赴一致希望的目标并把这种新方法用于最多数对象的国家。

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么，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长期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大事业的能力，而且又没养成共同去做大事业的习惯，那它不久就会回到野蛮状态。不幸的是，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公民越是软弱无力，就越是应当叫政府能干和积极，以使政府能够举办个人不能创办的事业。他们相信并且声称一切困难都能解决。也许政府可以代替美国人的某些巨大的社团，而且在联邦内部已有几个州这样做了。但是，美国人日常依靠社团进行的那些数量甚大而规模却很小的事业，要由哪个政府当局去代替办理呢？

不难预见，人们越来越不能单由自己去生产生活上最常用和最需要的东西的时代，正在来临。因此，政府当局的任务将不断增加，而政府当局的活动本身又将日益扩大这项任务。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这个原因和结果将不断循环下去。这样下去，凡是一个公民不能独自经营的事业，最后全要由公共的行政当局来管理。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险。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因此，民主国家要人为地创造这种作用，而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正是结社。

在民主国家，从属性上来说能够使一种新思想和感情顺利地进入周围人的心里和头脑里，只有政府当局。但是，不难看到，政府当局的这种作用经常是不充分的，而且往往是有危险的。在一个大国，政府之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和改进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正如它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管理一切实业部门一样。一个政府，只要它试图走出政治活动的范畴而步入这条新道路，它会不知不觉地要实行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暴政，因为政府只会颁布严格的规章制度，只支持它所同意的感情和思想，而且人们总是很难辨别它的这种表示是忠告还是命令。假如政府认为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于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那么，情况将会更糟。这时，政府将会一无作为，并由于喜欢酣睡而听任自己迟钝下去。

因此，必须使社会的活动不由政府包办。在民主国家，应当代替被身份平等所消灭的个人能力的，正是结社。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见，他就会立即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为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也会倾听它的意见。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的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四、结社和报刊的关系

而报刊对结社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叫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与其他一切人的力量自愿地联合起来，是无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只有利用报纸，才能经常地和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只有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一份报纸就像一位不请自来的顾问，它每天可向你扼要地报道国家大事而又不致扰乱你的私事。因此，随着人们日益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只在于维护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护文明。在民主国家，报刊往往引导公民去共同进行一些非常欠妥。但是，如果没有报刊，就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行动。因此，报刊带来的害处远远小于它的战功。报纸的功用不仅在于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而且还在于向他们提供所拟计划的共同执行办法。在民主国家，往往是大多数人希望联合和需要联合，但是办不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趋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了，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在民主国家，一个社团要想有力量，就必须人多。而由于成员的人数太多，所以他们只能分散在广大的地区，每个人仍然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去过他们的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为成千上万的小事而操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个使他们不用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不用开会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报刊。因此，没有一个民主的社团是能够离开报刊的。由此可见，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如果说社团的数目必将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而增加的说法是真理，那么，认为报刊的种类也将随着社团的数目增加而增加的意见，也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因此，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社团和报刊最多的国家。

报刊的发行情况与行政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并知道报刊的种数在民主国家是与行政集权的程度成反比的，即行政越集权报刊越少，越不集权报刊越多。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人民不会像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将地方权力委托给几个主要公民去执行。民主国家要取消这样的权力，而由当地的绝大多数人去行使。这些人可依法组织一个握有实权的常设机构，以管理本地的行政事务。于是，他们就需要一份报纸，使他们每天都能知道本地发生的小事和了解全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地方权力机构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权力的人也越多；而越是需要随时知道本地和全国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报刊。

美国报刊种类之所以多得惊人，缘于行政权的过于分散甚于政治的广泛自由和出版的绝对自由。假如美国的全体居民都是选民，而它又只实行由选民选举全国的立法机构的办法，那么，美国只要不多几份报纸就可以了，因为在这种条件下，选民们只能有少数几次非常重要的共同行动机会。但是在美国，除了全国性的大型集会以外，法律还规定在选举地方（州）、城镇，甚至乡村的行政官员时进行小型的集会。立法者就是这样使每个美国公民不得不经常同其他同胞协力去进行共同事业的，而每个美国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得看报读杂志。

美国每日出版的报刊所以种类甚多，是因为美国人既享有广泛的全国性自由，又享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性自由。身份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要薄弱，人们就越容易随大流和越难独自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一种报刊就代表一个社团。可以说：报纸是以全体读者的名义向每一位读者发言，而且读者个人的能力越弱，它越容易吸引读者。因此，报刊的影响力必随人们日益平等而逐渐加强。

五、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使人们每天行使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在世界上，也只有这个国家能使公民们想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行使结社权，并由此得到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凡是不准政治结社的国家，一般结社也极少。决不能轻言这是偶然的结果，而应当断言在这两种结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关系。由于偶然的原因，几个人可能在某一事业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比如，他们可能都要去办一种商业，或者都要去经营一种工业。于是，他们相会了和合作了，并逐渐认识到结社的好处。共办这种小事情的次数越多，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越来越获得共办大事业的能力。因此，一般结社有助于政治结社。但是，另一方面，政治结社又能使一般结社得到长足发展和惊人完善。在私人生活中，严格说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但在政治生活中，他就不会这样认为。因此，当人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候，任何一个公民每天都要在脑际浮现结社的思想和愿望：即使对采取共同行动本来有些反感，但为了党派的利益也得学会采取共同行动。因此，政治生活把结社的爱好和习惯一般化了，也就是使一些向来不过问政治而总是愿意单独行动的人，希望联合和学会结社的技巧了。

政治不但在创造大量的社团，而且在制造规模巨大的社团。在私人生活中，一个共同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引起一大群人去采取共同行动的情况极少；只有掌握了共同行动的技巧，才能去进行这种行动。在政治方面，结社的机会随时都可以从政治生活中找到。但是，结社的重要作用只能在规模巨大的社团中表现出来。个人力量薄弱的市民，不会一开始就对联合起来可以产生力量有明确的概念；而要使他们明白这一点，就得向他们示范。但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结社时，人数越多才越容易启示范作用。比如说，一千人联合起来可能使他们看不到利益，而如果人数达到一万就可能看到。在政治方面，人们联合起来可以做大事，而重大事情方面的结社所带来的好处，又会经过实践使人们知道在小事情上互助也有益处。政治结社可以同时将许多人拉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摆脱原来因年龄、思想、贫富而造成的隔离状态，进而发生相互往来和接触。他们只要相会过一次，就会设法再次相会。

因此，可以把政治结社看作是开办一所免费的大学，每个公民都可以到那里去学习结社的一般原理。使美国人逐日形成不问地位、思想和年龄而结社的普遍爱好和养成利用结社的习惯的，正是政治结社。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相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因此，美国人正是由于享有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才学会了可以尽量减轻自由所带来的危害的方法。

六、公民结社在当今美国社会

近年来，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里对公民结社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帕特南说，“社会资本”能够借由公民结社而得到发展，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帕特南为社会资本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他认为，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与公民美德、互惠信任、社会合作、集体归属感和集体行动有着密切联系；犹如一把螺丝刀（物质资本）或者大学教育（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生产力一样，社会关系对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也会产生影响；社会资本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信任的范围、社会合作的质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民主制度的绩效；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类型，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连接性社会资本和粘合性社会资本，或兼容性社会资本和排他性社会资本的差异。

帕特南论证了社会资本的正面意义：社会资本能够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所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是社区前进车轮的润滑剂”，在人们能互相信任、以及在社会成员可以重复互动的地方，日常的商业和社会交往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社会资本拓宽了我们的认知，培育我们的健康人格，“那些与他人——无论是家庭成员、朋友，还是玩保龄球的伙伴——有着活跃联系并互相信任的人们，培养并维持着一种对社会其他人有益的性格特征”；社会资本还通过心理和生理的过程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丰富的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外伤和更有效地战胜疾病。社会资本如果不是替代品的话，则似乎是某种补充物，就好像我们在街角药房所买的三氮烷、安眠药、抗酸剂、维他命C以及其他药品。‘早上打电话给我（或者事实上给任何人）’实际上可能要比‘吃两片阿司匹林’对治愈某些病症更有效”。总之，“社会资本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富有，以及更有能力去管理一个公正而稳定的民主社会”，甚而至于，“社会资本能够阻止坏事情发生在好孩子身上”。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影响。

面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衰竭，帕特南提出如下解决方案：第一，“我为美国的父母、教育者以及美国的年轻人们提出了以下的挑战：让我们努力在2010年前使即将成年的那部分美国人在社会各层次的公民参与程度恢复到和我们祖父那一辈人相同年龄时的水平，同时创造出比他们那一代更多的连接性社会资本”。第二，“我希望美国的雇主、工会领导、公职人员和雇员本身，让我们在2010年之前使美国的工作场所能变得如家人般友善和像社区一样令人愉快，这样美国人能够在工作内和工作外都补充社会资本的储备”。第三，“我希望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者、开发商、社区领导以及买房的人们，在2010年前少花点时间旅行，多花点时间和邻居相处。这样，我们生活的地方将会变得更加和睦，我们的社区规划和公共利用空间会鼓励产生更多的与邻里和朋友的休闲社交”。第四，“我对美国的教士、非神职领导人、神学家和普通的教徒们提出挑战：共同创造出一个新时代的多元化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觉醒’，这样在2010年前美国人会比今天有更多的社区精神，同时，对美国的其他宗教也会更加宽容”。第五，“我希望美国的媒体巨子、新闻记者、互联网巨头，和你我一样的用户一起，找到方法，在2010年前让美国人少花些时间被动地坐在屏幕前，多花些时间和邻里亲朋交流。让我们找到一种新的电子娱乐的方式来增强我们的社区参与”。第六，“要创造连接性社会资本，要求我们超越我们的社会、政治和专业背景，去和我们不同的人交流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团队运动对于社会资本的创造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在这方面同样重要但却没有充分发掘的是文化和艺术活动。一起唱歌（像一起打保龄球一样）不需要人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或者同样的社会地位。从这一点说，我希望美国的艺术家们、文化机构的领导和资助者们，以及普遍的美国人，在2010年前使更多的人参与文化活动（不仅仅是坐在一边欣赏），让我们以艺术作为中介，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把各行各业的人们召集起来，参加舞蹈社团、歌唱社团、社团的戏剧社等等”。第七，“政治和政府是我们探寻美国社会资本旅程的起点，也是总结关于重建美国社区联系的地方。在目前经常缺乏关于民主的公共论坛的情况下，重建联系、信任和公民参与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希望美国的政府公职人员、政治顾问、政治家以及所有公民，让我们在2010年之前使更多的美国人参与到社区的公共生活中来，竞选公职，参加公众会议，为委员会服务，组织竞选，参加投票”。

总而言之，托克维尔认为，各式各样的自愿结社或我们所谓的兴趣小组，是能让我们学会主动精神、合作能力和责任感的地方。通过关心自己的兴趣，我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托克维尔写道：“情感和观念焕然一新，心胸得到开阔，人的理智也得到发展。”通过自由结社，制度才能被塑造得足以抵抗中央集权的权威。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结社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民主公民。

【参考文献】

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200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2. 【美】史蒂芬·B·斯密什，《政治哲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 【美】罗伯特·伯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